

二〇一九年第二輯（總第十二輯）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烏雲畢力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烏雲畢力格 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二〇一九年第二輯（總第十二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烏雲畢力格 主編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2019 No.2) Vol. 12**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Oyunbilig Borjigidai Editor-in-Chie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

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主編：烏雲畢力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編委：沈衛榮 清華大學

索羅寧 中國人民大學

畢波 中國人民大學

劉迎勝 南京大學

華濤 南京大學

榮新江 北京大學

羅新 北京大學

烏蘭 中國社會科學院

寶音德力根 內蒙古大學

趙令志 中央民族大學

葉爾達 中央民族大學

黃維忠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 新疆大學

才讓 西北民族大學

陳維新 臺北故宮博物院

Christopher Atwood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Ling-wei Kung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Ralph Kauz 德國波恩大學

Lars Peter Laarmann 英國倫敦大學

二木博史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荒川慎太郎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井內真帆 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

承志 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

S. Chuluun 蒙古國科學院

Ts. Battulga 蒙古國立大學

Bakhyt Ezhnkhani-uli 中國人民大學、哈薩克斯坦國立L.N. 古米廖夫歐亞
大學

目 錄

天馬雙翼(2): 察合臺文在哈薩克與清朝交往過程中的媒介作用	巴哈提·依加漢	1
開魯縣遼代皇族墓葬出土墨書題記相關問題初步研究	長海 連吉林	22
“薩里達古寺”遺址發掘研究報告	楚倫 著 蘇日滕 譯	32
“Аяга” -нд орсон уу, “хөл” -д хүрсэн үү?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i>ауаγ-qa tegimlig</i> -ийн тухай өгүүлэх нь (進“碗”裏了還是到“脚”了? ——略論蒙古語 <i>ауаγ-qa tegimlig</i>)	Алтан Хасбаатар (哈斯巴特爾)	38
古代蒙古文學中“地獄”描寫之比較研究 ——以《格斯爾傳》《江格爾》《目連救母經》為例	賀希格蘇和	54
清朝順治—乾隆時期的耶穌會宮廷傳教士	胡耀文	68
Studies of the Mongolian Law Manuscript on Birch Bark (蒙古文 《樺樹皮律令》研究)	Jigmeddorj Enkhbayar (濟格木德多爾濟)	76
印度、中亞與中國新疆的“燃燈佛授記”圖像研究	廖志堂	95
16世紀中亞歷史文獻《昔班尼傳》研究	米吉提	154
從滿文四書五經政治類詞彙譯法的演變看清朝官方意識形態的變遷	曲 強	162
清初嫩科爾沁部牧地變遷考	薩出日拉圖	180
欽察七姓(Yeti)部落考	蘇日塔拉圖	193
釋五當召陽火鼠年鐵券文書 ——兼論五當召建寺年代	烏雲畢力格	201
伊斯蘭史書對蒙古起源論的建構	特爾巴衣爾	207
Statutes of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s (<i>Šasin-ü jakirγan-ü dūrim</i>) as Sources on the His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教法管理章程”研究: 寺院與國家之間歷史 關係的來源)	Ts. P.Vanchikova (旺其科娃)	224

Contents

The Two Wings of the Heavenly Horse (2): Chagatay (Turki) as A Communication Tool in the Interflow between Kazakhs and Qing	Bakhyt Ezhnkhani-uli	1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of Ink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from Royal Tombs of the Liao Dynasty in Kailu County	Changhai Lian Jilin	22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Ancient Temple of Saridag	Sampildondov Chuluun	32
Bowl or Feet? On the Mongolian Buddhist Terminology <i>ayaγ-qa tegimlig</i>	Altan Khasbaatar	38
Comparing the Depiction of the “Underworld/ Hell” in Ancient Mongolian Literature: On the <i>The Epic of King Geser, The Epic of Janggar, The Scripture of MolonToin’s Good Deeds to His Mother</i>	Byambatseren Kheshigsukh	54
The Jesuits in Royal Court from 17th to 18th Century	Hu Yaowen	68
Studies of the Mongolian <i>Law Manuscript on Birch Bark</i>	Jigmeddorj Enkhbayar	76
Iconographical Analysis on Dīpaṃkara Jātaka Images from India,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Liao Zhitang	95
Research on the 16th Century Historical Document <i>Shibaninama</i>	Abdumijit Abdulla	154
The Changes of Official Ideology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Terms’ Translation in <i>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i>	Qu Qiang	162
The Study on Pasture Transition of Non Qorčın Trib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achuraltu	180
A Study in the Origin of the Yeti Tribes	Surtaltu	193
On the Fire–mouse–year Document of Badkar Monastery: A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Badkar Monastery	Oyunbilig Borjigidai	201
Islamic Classics and its Construc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Narrative of Mongolian Origins	Töröbayar Choros	207
Statutes of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s (<i>Šasin-ü jakiryān-ü dūrim</i>) as Sources on the His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Ts. P. Vanchikova	224

天馬雙翼（2）：察合臺文在哈薩克與清朝交往過程中的媒介作用

巴哈提·依加漢

一

在本系列論文的第一篇，^① 筆者們討論了托忒文在哈薩克與清朝交往過程中的媒介作用。其中提到研究清代天山南路文書語言制度者如博大衛甚至把準噶爾汗國前後的蒙古文（托忒字蒙古文）稱為“通用語文”（*lingua franca*）。^② 不過，在承認蒙古語文廣泛傳播於 13 世紀後歐亞大陸上的事實，承認托忒文在清朝進入天山南路初期的重要媒介作用的同時，我們似乎需要對蒙古語及托忒文在中亞影響的地域和時段做更具體的分析。首先需指出，儘管明代以降哈密、吐魯番等地統治集團成員掌握蒙古語的傳統為清朝在天山南路地區傳達其統治意志提供了一定的文書方面的便利條件，但這一條件對於整個天山南路地區來說顯然是不充分的。正如筆者在本系列論文的第一篇中指出的，在其實行於天山南路地區的文書制度中，清朝的確使用了托忒文，但除了托忒文外，其寫往天山南路的文書還有察合臺文（滿文中稱之為“*hūise gisun i hergen*”，清代漢文文獻中稱其為“回文”。我們權且把它理解為“狹義的回

① 巴哈提·依加漢：《天馬雙翼（1）：托忒文在哈薩克與清朝交往過程中的媒介作用》，烏雲畢力格主編《蒙古學問題與爭論》第 15 期（*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No.15），2019，第 51—69 頁。

② Brophy D.,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3 No. 2, 2013, pp. 231-258. 博大衛原話為：“Judging from the Qing archive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irat Mongolian written in the Todo, or ‘clear’ script, served as a *lingua franca* throughout the Junghar domains.” 而作為支撐其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之一，博大衛舉出了哈薩克往清朝寫過幾份托忒文信的事實。博大衛是從野田仁和小沼孝博所著《哈薩克諸蘇勒坦致清朝文書集》（*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一書中注意到這些哈薩克托忒文信的。而野田仁和小沼孝博書中收錄的三封信中的兩份轉引自筆者所編以下著作：Еженханұлы Б. (құрастырған, аударған және түсіндірмелерін жазған), *Қазақ тарихы туралы қытай деректемелері. Том III. Цин патшалық дәуірінің мұрағат құжаттары*.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баспасы, 2006. 除博大衛此處提到的這幾件外，筆者在《天馬雙翼（1）：托忒文在哈薩克與清朝交往過程中的媒介作用》一文中給出了更多哈薩克托忒文的信息。但哈薩克使用托忒文與清朝交往的歷史是限於一定的地域和時間的。見下文有關討論。

文”^①），二者是並行的，旨在更有效地溝通往來，清朝曾加強對察合臺文的研習，加強有關文書制度的建設。在天山南路的實地需要自然是促使建立這一制度的最主要刺激因素。從這一點出發，所謂“清代衙門維吾爾語乃是地方性產物”的結論^②，當有其一定的合理之處。然而，有一個不容低估其意義的事實是，因為有朝廷的有意經營，察合臺文方可成為清朝與其直接統治的天山南路六城之地甚而中亞其他突厥語族地區溝通的最重要媒介手段。包括察合臺文在內的多體語彙書籍的編撰乃是清廷這一主動性作為的一種表現。提及這類書籍，人們自然會首先想到《西域同文志》《五體清文鑑》等規模較大的辭書；除此之外，清廷在乾隆朝時期實際上還編著了各種規模較小的“字書”亦即詞彙及常用語對照讀本。^③毫無疑問，清廷編撰這些辭書和“字書”的現實目的中必有用察合臺文繕寫公文的因素。祇是囿於明代“四夷館”傳統的影響，清廷未設立專門機構來系統主持與察合臺文相關的事務。^④但這並不

① 隨著時代及其相應政治－歷史話語的演變，在清代滿文文獻中被稱作“hūise i gisun”的這一文獻語言後來被冠以各種名目：或稱“回文”，或稱“帕爾西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的不少相關文獻即被冠以此名），或稱“察合臺文”，或稱“維吾爾文”。據筆者的認識，儘管其大部分呈現出突厥語族東部葛邏祿語的明顯特徵，但清代檔案中存留的這些文獻的語言宜被稱作“察合臺文”。此外，雖然清代稱此文獻語言為“回文”，但彼時的所謂回文也適於各種波斯文文獻。所以，如果非要突出其清代特徵，那麼，稱這些用阿拉伯－波斯字母書寫的突厥語文獻為“狹義的回文”可能更為合適。

② 參見 Brophy D.,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3 No. 2, 2013.

③ 據筆者所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現藏有三種包含“回語”（即察合臺語，後人亦有稱之為“維吾爾語”的）的此類孤本“字書”。由於故宮博物院的有關規定，此三種歷史文獻筆者未得寓目，在此祇能轉述該館研究員春花介紹如下：（1）《滿蒙維三體字書》[這應是其當代所得名。據介紹，其漢名亦作《滿蒙回文三種譯語》及《滿蒙回三語合璧書》。該書滿文名為 *Manju monggo hūise*（春花書中訛作“hoise”）*ilan hacin i gisun*。此外，春花也給出了該書的蒙文名稱，三冊不分卷，共 157 頁，收 1256 組詞語條目。（2）《滿蒙藏維四體字書》（亦有滿蒙文書名。需指出的是，介紹者似把滿語表示“四體”的“duin hacin”訛寫成了“sunja hacin”），一冊，共 100 頁，約收 400 組詞語。（3）《滿蒙藏嘉戎維語三體字書》（亦有滿蒙文書名），共 378 頁，收 746 組詞語。（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第 176—184 頁）需要指出的是，海涅什（E. Haenisch）早在 1954 年撰“Ein dreifacher Sprachführer Mandschu-Mongolisch-Turki in kurzer Auswahl von 110 Beispielen”一文（見 Kaizuka Shigeki ed.,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 Kenkyusyo*, Kyoto: Kyoto University, 1954, pp. 184-91），其中涉及《滿蒙回文三種譯語》當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現藏“字書”之第一種。博大衛在其論文中利用了海涅什文中提供的 2—3 組詞語對自己所提出的“清代衙門維吾爾語曾受到蒙古語影響”的論點做了討論（參見 Brophy D.,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3 No. 2, 2013）。

④ 明朝所謂“回文”大多指的是用阿拉伯－波斯文字母書寫的各種波斯語文書，明四夷館中的“回回館”便是處理這些波斯語文書的機構。四夷館中與突厥語有關的機構乃是“高昌館”。然而，高昌之地的突厥語民衆原是使用回鶻體畏吾兒文字書寫其語言的，所以“高昌館”與察合臺文文獻並無直接的聯繫，現存“高昌館來文”均為回鶻體畏吾兒文即為其證明。但這並不意味著“高昌館”與察合臺文毫無關係。下面的歷史事實可以說明這一點：用阿拉伯－波斯字母所書寫的中亞地區察合臺語文書傳至明朝的歷史可追溯至明正德十三年（1518）之前，因為在這一年的時候，明朝官員曾在檔案中查找西域“投進”的“高昌話回回字番文”。據劉迎勝教授的解釋，“所謂‘高昌話回回字番文’肯定是察合臺文，即以‘回回字’拼寫的高昌語言”；劉教授還指出：“在《回回館雜字·地理門》中，‘高昌’這個漢語詞的對應詞就明白地作 *Turki*，並音寫為‘土兒幾’，即‘突厥的’。明代內地人是通過與畏兀兒人的交往來認識中亞的突厥語的，所以‘高昌話回回字番文’就是以波斯語字

表明清廷在其公文制度建設過程中不曾建立起用察合臺文與中亞突厥語族進行溝通交往的某種機制。筆者曾在本系列論文的第一篇中引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信息平臺所見檔案號為03-0177-1682-031、題名為《奏將回文托忒文之上諭恭呈御覽後裝匣送兆惠處》、清軍機大臣傅恒寫於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758年3月29日)的一篇滿文奏片中提到的與清朝早期西域公文制度有關的乾隆諭旨，並指出：在與中亞各族建立聯繫初期，清廷對不同的民族或地區所使用的文書語言也是有區別的，對於天山南路，它使用的是托忒文和察合臺文，而對於哈薩克和布魯特，它使用的則是滿文和托忒文。哈薩克人和布魯特人使用托忒文而非回文的情況反映出：對於剛剛正式涉足“西域”事務、需要充實並完善其公文制度建設的清廷來講，還沒有廣泛使用察合臺文與包括哈薩克和布魯特在內的所有中亞突厥語族進行交流的條件。但是，這一情況在後來是有變化的。近年來，筆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到一批用察合臺文繕寫的諭旨。^①存在察合臺文清朝諭旨的事實本身即已充分說明察合臺文在清朝公文制度建設中並不祇具有地方性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察合臺文也曾成為清廷公文制度中的一環，成為清廷據以與包括哈薩克在內的“外藩”進行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

而對於中亞突厥語各族來講，用阿拉伯-波斯文字母書寫的察合臺文經由15-18世紀的發展早已成為其共同書面語。事實上，察合臺文在17-18世紀不僅是突厥語族之間的交流媒介，它也被中亞突厥語族用來與其他語族或政權進行溝通。以下事實乃是其證據：從布哈拉汗國檔案中反映的情況來看，該汗國統治者在18世紀20年代曾用察合臺文致信於準噶爾統治者。^②

基於中亞歷史的這一大背景，作為突厥語族穆斯林的哈薩克人使用察合臺文就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情了。哈薩克斯坦學者伊莉娜·葉若菲耶娃集其多年搜尋所得，於2014年出版了題為《1675至1821年間哈薩克統治精英們的書信遺產》的二卷本史料集。^③此史料集收錄了808件察合臺文及3件托忒文書信；其中的大部分信件是所述時期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

母(比阿拉伯語多四個字母)拼寫的中亞突厥語”(劉迎勝：《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交往中的翻譯和語言學習問題》，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54-84頁)。清朝建立後直至18世紀中葉，也有用察合臺文寫成的書信被送抵清廷的史實(如博大衛提到的1696年避亂至清廷的拉失德汗帶去的寫給康熙的幾封信)。平定準噶爾和大小和卓後，使用察合臺語文與天山南路民眾進行交流成了清朝直接而經常性的行為，且這一行為所涵蓋的範圍也逐漸延伸到了與諸如哈薩克、浩罕之類“外藩”進行的交流之中(見下文)。但是，儘管有清一代察合臺文逐漸成為其正式文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清朝並沒有設立過中央一級負責處理察合臺文書事務的專門的固定機構，朝廷的相關事務是交由理藩院蒙古房處理的。

① 有關清代察合臺文諭旨的內容，筆者擬另文討論。

② 有關內容的研究見 Holzwarth, Wolfgang, "Relations between Uzbek Central Asia, the Great Steppe and Iran, 1700-1750," In: *Shifts and Drifts in Nomad-Sedentary Relations* (2005): 179-216. 此外，以下文章也涉及這一內容，Sultanova G., "Reflection of Bukhara-Zhunghar Relations in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In: D.A. Alimova ed.,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in Modern Medieval Studies*, Tashkent: Yangi Nashr, 2013, p. 148.

③ Ерофеева И.В., *Эпистоля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казахской правящей элиты 1675-1821 гг.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2-х томах*. Алматы: «АБДИ Компани», 2015.

族成員寫往沙俄各級政府的。^①從中我們看到，哈薩克汗國統治者至遲在頭可汗統治時期的1675年就已開始使用察合臺文。而且，如果我們把哈薩克與清朝建立正式關係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作為一個截止日期的話，那麼，哈薩克統治集團成員至該時間為止用察合臺文寫成的各類信件就有322份之多。這說明，哈薩克統治上層使用察合臺文書寫公文的傳統是由來已久的。

當然，由於其遊牧生活方式的特點，哈薩克社會內部可能並未建立過代代相沿的固定的文書制度。但是，豢養來自中亞南部地區的經師和書記員為其服務則是哈薩克汗國統治集團各家族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與此相關，18世紀英國旅行家、畫家約翰·卡素（John Castle）所著旅行記^②中留下的一幅畫首先映入我們的腦海。這幅畫是約翰·卡素於1735年6—8月在哈薩克小玉茲旅行期間畫成的，是其遊記中所展示的一整套民俗及人像插畫中的一幅（見圖1）。根據約翰·卡素書中的記述，此畫中所呈現的三人分別是哈薩克小玉茲汗阿布林海爾、阿布林海爾汗之子葉拉里^③（Erali）以及一“布哈拉毛拉”。從其懷抱經書緊隨阿布林海爾汗父子的形象來看，這裏的“布哈拉毛拉”乃是哈薩克小玉茲汗廷的伊斯蘭教經師及教育貴族子弟的私塾先生無疑。

① 不過，編著者把哈薩克人寫往清朝的一些書信也收入書中。例如，其所收2件托忒文信和2件察合臺文書信即采自本文作者編著的如下史料集：Еженханұлы Б. (құрастырған, аударған және түсіндірмелерін жазған), *Қазақ тарихы туралы қытай деректемелері. Том III. Цин патшалық дәуірінің мұрағат құжаттары*.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баспасы, 2006 (以下簡稱“Еженханұлы 2006”)。在此，還需提及這樣一個事實：有關哈薩克察合臺文書信的研究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出現。俄國學者Я.В. 哈尼闊夫就刊布了小玉茲哈薩克首領阿布勒海爾與伊朗納迪爾沙之間來往的兩份含有察合臺（Turki）文內容的信件（Я.В. Ханьков, *Поездка из Орска в Хиву и обратно, совершенная в 1740–1741 гг. Гладышевых и Муравиным*. СПб., 1851. Приложение. С. 1)。有關寫往沙俄的察合臺文哈薩克書信的重要研究發生於1940年的蘇聯。在《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歷史資料》（第四卷）一書中，М.П. 維雅特金公布了俄國檔案中所藏的、哈薩克人於1785—1828年用察合臺文寫給俄國政府的10件各類文書 [М.П. 維雅特金把它們分類作“прошение”（呈文）、“уведомление”（通告）、“донесение”（報告）]。見Вяткин, М.П.,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т. IV. М.–Л., 1940。以下簡稱“維雅特金1940”，並針對哈薩克察合臺文書信語言特點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見下文中的有關討論。

② 約翰·卡素（John Castle）遊記流傳較廣的是其1784年的德文譯本 *Journal von der Ao. 1736 aus Orenburg zu dem Abul-Geier Chan der Kirgis-Kasack Tartarischen Horda aus freiem willen und bloß zu dem bestem des russischen Reiches untergenommenen höchste nöthigen und zwar gefährlichen doch glücklich volbrachten Reise, dargestellt durch John Castle einen Engländer und gewesenen Kunstmaler bei der Orenburgischen Expedition*. «Materialien zu der Russischen Geschichte seit dem Tode Kaisers Peters des Großen». Zweiter Teil, 1730–1741, Riga, 1784。遊記中有關哈薩克的插畫在如下蘇聯及哈薩克斯坦學者的著作中被引用過：（1）Есмағанбетов К., *Көне қазақстанды көргендер (көне дәуірден XVIII ғ. орта кезіне дейін)*, Алматы: «Кітап» баспасы, 1979; （2）Ерофеева И.В., *Хан Абулхаир: полководец, правитель, политик*.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2007; （3）Ерофеева И.В., *Эпистоля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казахской правящей элиты 1675–1821 гг.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2-х томах*。本文插圖轉引自第一種著作即 К. Есмағанбетов 書第64—65頁。

③ 此即後來《清高宗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等清朝史籍中出現的哈薩克“額爾雷”（此漢譯名乃是因滿文繕寫時音點錯位致使“erai”訛讀為“erlei”所致）。



圖1 約翰·卡素旅行記中的人像插畫

18世紀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族招引中亞南部突厥語定居民中的宗教人士來草原從事伊斯蘭經文教育、充當家族私塾先生及文字書記員的情況在近十多年來發布的滿文檔案文獻中亦有所反映。如以下二則史實即為其例：(1)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1780年10月23日)伊犁將軍伊勒圖收到哈薩克“王”阿布勒必斯用察合臺文寫來的一封信，信中阿布勒必斯請求伊勒圖為其遣出的某人提供經由伊犁赴喀什噶爾的旅行便利，並說道，“此人乃是我們的毛拉，多年以來教授著吾子卓勒齊和博普以回教之道。他是喀什噶爾人，來自 Ar-Artuš”；^①(2) 據署伊犁將軍保寧寫於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六日(1790年9月14日)的一份奏摺，當時赴伊犁貿易的哈薩克首領告訴保寧：“我這次帶來的人當中有三名安集延回子……他們是八年前來我處的，當時我們讓這些人留住了下來，讓他們教我們的子弟讀經文。”^②

來自中亞南部的經師兼書記員以及接受其文化教育的貴族子弟們的存在為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族利用察合臺文與外界溝通提供了可能。所以，哈薩克人在與清朝接觸伊始原本可以利用察合臺文進行交流。不過，正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清朝在著手處理天山南路及其相鄰中亞地區事務之初，還沒有廣泛使用察合臺文向所有中亞突厥語族發送公文的條件，所以清廷最初是用滿文和托忒文兩種文字書寫公文予哈薩克和布魯特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逐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案號：2852-022(047-2347)。察合臺文原文作“köb yïlardin beri bizniñ hizmetimizdä bolub Joċi sultan Bofu sultan uýullarimizya Musulmanliqni ürkete (sic. <Kaz. üyrete) turyan mullamiz yirdi özi Qaşqarlıq Ar-Artuš digän yerdin ikän”。

^② 該奏摺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189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第180—184頁。本處所引滿文原文作“ere mudan mini gaiŋi gajihä urse dorgi. ilan anjiyan hüise bi...ce jakün aniya onggolo meni nukte de isinafi. be cembe bibufi. meni ahün deo. juse de nomun tacibume tehe”。

漸發生改變。從滿文檔案史料所反映的情況來看，起碼是從乾隆三十年（1765）開始，哈薩克已經用察合臺文向清廷發送書信（見下）。儘管在隨後的20年裏哈薩克人並未完全停止使用托忒文，但作為公文書信語言，察合臺文在此後的清哈交往中逐漸成為主要的交流媒介。而這一變化與清朝的邊境政策的調整有極大的關係。

二

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秋與清廷建立正式關係後，除了不定期地派出使臣赴清廷朝覲請安、向清朝皇帝提出各種請求外，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族還需經常派出人員與清廷及其地方大員交涉，處理雙方之間發生的諸如貿易、逃入及偷盜之類的具體事務。哈薩克寫往清廷的書信更多是與這些具體事務相關的。這種書信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寫往清廷的，二是寫給清朝駐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伊犁甚至喀什噶爾等地將軍大臣們的。滿文文獻把這兩種書信均稱為“bithe”。在此，對與寫往清朝哈薩克文書之傳達管道相關的問題需略加說明。儘管在早期，哈薩克人有路經烏里雅蘇臺由北邊的蒙古之路東行出使的，也有向東南直接去烏魯木齊貿易的，但到後來（自伊犁將軍設立前後開始），哈薩克統治集團的使臣代表抑或其商團在清朝控制地域內行走的路綫逐漸被規範化。除了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可以自行處置的事宜之外，清哈之間幾乎所有的重要事務均需經由清伊犁將軍之手來處理。東赴清廷的哈薩克人亦需首先赴伊犁。這幾乎成了清朝要求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族遣使時遵守的一項成規。這樣，除了決定是否容許來到伊犁或塔爾巴哈臺的哈薩克人繼續前往北京或熱河外，伊犁將軍和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也成為最早接觸並組織翻譯哈薩克書信，並把這些書信作為其奏摺附件上呈皇帝的人員。^①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地方一級處理文書的條件與中央政府是有所不同的。由於伊犁地區自準噶爾時期以來就有塔蘭奇回人被遷入，清朝平準後又有“回屯”建設，故清朝伊犁將軍府自一開始便具備了處理察合臺文的人員和能力；而清屬塔爾巴哈臺地區則沒有這類回人^②，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最起碼到乾隆四十八年為止，見下文）該地是沒有處理察合臺文文書條件的。

實際上，清朝建立伊犁將軍制度的時期也是其為充實原準噶爾之地的疆域而調整民族政策的時期。由於厄魯特遺衆已不復原有的組織和勢力，而在文化上他們又本是滿洲－蒙古的親近族群，因而，也就是在設立伊犁將軍前後，清政府開始實施吸納厄魯特遺衆回歸清朝治

① 在其著作中，野田仁甚至認為清朝邊疆大臣的這種把哈薩克來文作為其奏摺附件上呈皇帝的做法是一種固定制度 [Noda Jin,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Joint Usage)/Research Center for Islamic Area Studies TIAS 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eries Special Issue 1*], p. 8. Department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以下簡稱“Noda and Onuma 2010”)。但需要指出的是，哈薩克來使堅持要親自呈遞書信於清朝皇帝的情况也有幾例，因此，似乎不應把上述以奏摺附件形式呈遞哈薩克來文的做法視作是清哈文書來往中的定制。

② 這裏需說明，清朝亦有視哈薩克為“回人”之一種的情形。所以，此處所指乃是“定居務農的回人”。

下的政策；清朝希望利用數年前還被視作清剿對象的這些厄魯特人回歸清朝境內的做法來部分地達到充邊固疆的目的。其結果之一便是，原或為避難或被擄掠而至哈薩克的許多厄魯特人在 18 世紀 60—80 年代陸陸續續地逃入或被哈薩克人主動交付給清朝。這一變化對於托忒文作為清哈交流媒介的地位也造成了影響。

這種影響首先反映在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族處理托忒文所需人員的流失上。在本系列論文的第一篇，筆者曾提及阿布賚汗的妻弟巴雅爾於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1763 年 8 月 4 日）投往清朝的故事。^① 其實，從近十多年來公布的滿文檔案中所反映出的有關信息來看，在 18 世紀 60 年代之後流入清朝境內的厄魯特人中不乏曾經充當哈薩克使臣者。例如，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哈薩克檔》所存檔案號為 03-18-008-001754-005、題名為《乾隆年間哈薩克名冊》（以下簡稱《名冊》）之檔冊和相關奏摺可知，除上述巴雅爾外，起碼還有一些厄魯特人先是代表哈薩克統治集團各家族出使清廷，後來遷居到了清屬伊犁之地（見表 1）。

表 1 原代表哈薩克出使清廷、後遷居清屬伊犁之厄魯特人

序號	姓名	出使清廷時間 ¹	何人遣出	受封賞情況	遷往伊犁時間	史料出處 ²
1	巴桑 (Basang)	QL23, QL25, QL26	阿德勒班必特, 阿布賚	五品頂戴 (QL25)	QL26 (1761)	《名冊》第 0015 膠片;《清高宗實錄》卷 670, 第 9 頁下 ³
2	圖倫孟克 (Turungmungke ⁴)	QL25, QL27	阿德勒必斯	五品頂戴 (QL25)	QL28 (1763)	《名冊》第 0021 膠片;《新疆檔》, 65: 59-62, 愛隆阿摺 ⁵
3	巴惕西 (Batisi)	QL37	杭霍卓 (阿德勒必斯子)	六品頂戴 (QL37)	QL40 (1775)	《名冊》第 0112 膠片;《新疆檔》, 110: 61-66, 舒赫德摺 ⁶
4	都喇勒 (Dural)	QL47	瓦里 (阿布賚汗子)	六品頂戴 (QL47)	QL47 (1782)	《名冊》第 0148 膠片;《新疆檔》, 150: 133-139, 153: 7-10, 伊勒圖兩份奏摺 ⁷

1 表中的 QL 表示“乾隆”年號。例如，“QL25”乃是“乾隆二十五年”的代稱。

2 此處簡稱之史料：(1)《名冊》，《乾隆年間哈薩克名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哈薩克檔》，檔案號：03-18-008-001754-005；(2)《清高宗實錄》，慶桂等編撰《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3)《新疆檔》，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3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中的這條記載涉及巴桑“棄其所有產業，挈眷來投”之事。

4 在《乾隆年間哈薩克名冊》中此名作 Turungmungke，而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 65 冊第 59—62 頁中的愛隆阿奏摺中作“Turungmungke”。

5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 65 冊的該奏摺提及圖倫孟克移居伊犁事。需要指出的是：該書編纂者把具奏者誤寫成了“伊勒圖”（見第 2 頁目錄）。

6 涉及乾隆三十七年出使一事。奏摺中所附阿德勒必斯察合臺文信的滿文譯文中出現杭霍卓使臣名“batisi”。

7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 150 冊提及使臣“dural”之名，第 153 冊中提及賞戴頂翎事。

① 見《天馬雙翼（1）：托忒文在哈薩克與清朝交往過程中的媒介作用》一文注 18。

在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哈薩克人遷往清朝直接管轄的伊犁之地，其中包括懂蒙古語並在哈薩克與清朝的交往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員。哈薩克烏默爾^①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準噶爾統治時期出生於伊犁地方、與上述巴雅爾一樣亦是阿布賚汗妻弟的烏默爾^②，早在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1755年9月1日）就曾作為阿布賚使臣往赴清軍將領班第等人的軍營。^③此後亦曾數次代表阿布賚與清朝交往。乾隆二十七年赴清廷朝覲時，受封三等頂戴。其受封三等頂戴的事實亦體現了他在哈薩克社會及清哈交往中的地位。乾隆二十八年八月至二十九年初，烏默爾兄弟八戶共三十餘口遷居清屬伊犁。^④

由於托忒文書寫人才的流失，哈薩克人在其與清朝的公文交流過程中逐漸轉向使用察合臺文。而這也促使清朝不得不改變其對於哈薩克的公文政策，逐漸加大了使用察合臺文的分量。這一點首先表現在清地方一級政府與哈薩克的交往中。伊犁將軍伊勒圖寫於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七日（1781年3月31日）的一份奏摺中的如下話語是這一變化的最好寫照。

baicaci. tarbahatai i ba / hasak de jecen acahabi. hasak sa / tarbahatai i hebei amban de bithe alibure. / tarbahatai i ambasa hasak sade bithe afabure / baita kemuni bi. neneme hasak sa / bithe alibure de. gemu tot hergen / baitalame. tarbahatai i bade hasak sade bithe / afabuci. inu tot hergen i bithe baitalame / ofi. uthai tubai tot hergen bahanara / ūlet sede afabufi ubliyambume arabumbi. talude / hasak sa aika hūise hergen i bithe / alibuci. tubade hūise hergen takara niyalma / akū ofi. ili de benjibufi ubliyambufi / benebum-

① 小沼孝博在其著作中把此人及其名為古瓦特、色楞伯特的兄弟指稱為“厄魯特人”（Noda and Onuma 2010, p.156），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1763年10月12日）的一份奏摺（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哈薩克斯坦東方學研究所編《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第2冊，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第335—337頁）中提到烏默爾兄弟古瓦特、色楞伯特“始抵伊犁，即自行挑選遊牧地，聲言不習慣與厄魯特共居”，此乃是他們出身哈薩克而非厄魯特的證據。

② 關於其出生於伊犁並從小生活於準噶爾人之中的經歷及其後來與阿布賚汗的關係，見《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第2冊，第69—72頁（伊犁參贊大臣阿桂奏摺）。

③ 清朝定北將軍班第的相關奏摺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哈薩克斯坦東方學研究所編《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第1冊，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第7—12頁。其哈薩克文譯文見Еженханұлы Б. (құрастырған, аударған және түсіндірмелерін жазған). *Қазақ хандығы мен Цин патшалығының саяси-дипломатиялық байланыстары туралы қытай мұрағат құжаттары*. Том I, 22—23—66.,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баспасы, 2009（以下簡稱“Еженханұлы 2009”）。

④ 烏默爾兄弟遷居清屬伊犁，乃是引起清廷乃至清高宗注意的一個特殊事件。由於烏默爾在乾隆二十七年利用其出使清廷的機會提出此要求時提到其遷居的計劃也得到阿布賚汗的支持，故清高宗一開始懷疑這是阿布賚欲在伊犁安插眼線的行為。但清高宗後來打消了疑慮，准許烏默爾兄弟八人攜眷移居，而且還允許烏默爾本人在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在遷居伊犁途中折赴北京朝覲。乾隆二十九年正月，烏默爾與其先期抵達的兄弟們相會並定居於伊犁。相關史料見《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第2冊所收如下滿文檔：第29檔（第66—69頁）、第105檔（第274—277頁）、第114檔（第289—303頁）、第121檔（第315—319頁）、第126檔（第335—337頁）、第144檔（第389—391頁）、第163檔（第451—454頁）、第182—183檔（第509—513頁）。

bihe. te tarbahatai i hebei amban hailing ni / bsaci. duleke aniya ukanju yolbotu be / gaije jalin. hasak abulbis de tot / hergen i bithe afabuha de. ceni bade / umai tot hergen takara niyalma akū / ofi. ai baitai jalin afabuha be / sarakū. amala abulbis i jui jolci be / acafi. dere tokome getukeleme alafi. ulame / abulbis de anggai alira jakade. teni / afabuha bithei dorgi turgun be safi. / jolboltu be jafafi benjihe. turgun be / fonjici. hasak sade umai hergen akū. / onggolo ceni bade ūlet se labdu / ofi. tot hergen i bithe alibumbihe. ere / utala aniya ūlet se siran siran i / baime dosinjifi. tot hergen takara niyalma / komso oho turgunde. ere udu aniya ce / gemu hūise hergen i bithe alibumbi. ede / cende bithe afabure de. hūise hergen / baitalario seme baiha mudan bi. ereci / julesi. ceni alibuha hūise hergen i bithe. / abulbis sede bithe afabure de. aika / ili de benebufi. hūise hergen i arafi / benjihe manggi. jai icihiyara. cende afabure / oci. amasi julesi largin banjinambime. / tookabure sartabure be inu akū obume / muterakū. tarbahatai de emu juwe hūise / hergen takara arara niyalma bici. baita de / tusa seme aha de hebtme jasinjihabi. / baicaci. hasak sa ere sidende / tot hergen arara niyalma baharakū de. gemu / hūise hergen arafi unggireo seme baiha / babi. te hailing ni baci. tarbahatai de / umai hūise hergen takara arara niyalma / akū. mudandari ili de benjibufi ubliyambuci. / tookabure sartabure be boljoci ojarahū. ili i / hūise hergen takara arara niyalma be. / tarbahatai de emke juwe unggire babe / hebtme jasiijhangge. hono siden i baita de / tusa ogoro be bodome gūniha. giyan i / ini jasinjiha songkoi ili ci hūise / hergen takara arara niyalma be tucibufi / unggici acambi. baicaci. ili i gūwa aiman i / coohai dorgi. umai hūise hergen takara / arara niyalma akū. damu usin tarara / arara niyalma kemuni bi. aika hūise / hergen takara arara niyalma teile unggici. / hūise gisun hafumbume muterakū de inu ubliyambume muterakū. urunakū emu hūise / hergen takara arara niyalma. jai emu / hūise gisun hafumbume mutere niyalma be / sasa unggici teni ubliyambume mutembi. uttu / ofi, aha i baci. ili i hūise sei / dorgi. hūise hergen takara arara mutere. jai hūise gisun hafumbume muterengge be / emte sonjofi. tarbahatai de unggireci tulgiyen. / ese gemu usin tarire banjimbime. boigon / anggala bi. hon goidame teci. ceni / banjire were de tusa akū. cembe / inu gūwa aiman i coohai adali emu / aniya emteri halabuki. jai ese siden i / baita jalin tarbahatai de alban kame / yabure be dahame. inu anafulara ūlet / coohai adali cende dabsun sogi menggun / kunesun bahabuki.

（漢譯）查得，塔爾巴哈臺之地與哈薩克相連，哈薩克人和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均有相互致信之事。從前，哈薩克人的來信均以托忒文寫就；塔爾巴哈臺之地割付哈薩克人時，所使用者亦為托忒文。彼處^①懂托忒文的厄魯特自可為其翻譯、書寫。間或亦有

① 此既指哈薩克，亦指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處。

哈薩克人用回文呈來書信者，值此情形，彼處^①則因無人識讀回文，所呈回文書信會被攜至伊犁譯出後再送回。現今，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惠齡來文與臣相商，稱：“去年為取獲逃人岳勒伯勒圖，曾用托忒文割付哈薩克阿布勒必斯。但因為其地無識讀托忒文者，該哈薩克竟不知為何割付於彼。而後，吾與阿布勒必斯子卓勒奇會面時，彼親承口傳，方知割付內容，並送來岳勒伯勒圖。究問其因，哈薩克人竟全無文字。^②過去其地因厄魯特人衆多，故彼等得以呈來托忒文書信。這些年，厄魯特人不斷投奔而來，致使其地識讀托忒文者減少。故此，彼等這幾年全用回文寫信矣。有鑒於此，彼等儻有詢問吾處能否用回文覆信之情形。從今往後，阿布勒必斯等人呈來回文書信而需吾處回覆時，如果先把來文攜至伊犁，在伊犁寫出回文信，把寫好的回文信送回這裏後再發往彼等的話，則來回奔波，徒生煩擾；甚而誤事，亦無可知。而如果塔爾巴哈臺有一二識讀並會寫托忒文之人，則於事有所裨益矣。”

查得，這段時間，哈薩克人因不得書寫托忒文之人，故均以回文寫來書信；而且，因其地無識讀托忒文之人，哈薩克阿布勒必斯請求用回文寫割付回覆彼等。現在，惠齡則來文與臣相商，稱：“塔爾巴哈臺無識讀並會寫回文之人，而如果每次都送往伊犁翻譯的話，抑或會誤事。請從伊犁遣來一二識讀且會寫托忒文之人於塔爾巴哈臺。”此乃是為相互間公務帶來益處之想法，理應照其來文中所說從伊犁選出識讀並會寫回文之人遣往。查伊犁外旗軍隊當中竟無識讀並會寫回文之人，然種田回子當中則有此種人。不過，設若祇遣去識讀並會寫回文之人，而所遣之人不會翻譯回語^③的話，則又無法譯出來文。在遣去識讀並會寫回文之人外，必須一同派去可翻譯回語者一人，方可譯出來文。故此，臣欲自伊犁回子之中挑選一名識讀並會寫回文之人和一名可翻譯回語者，遣其赴塔爾巴哈臺。此外，因為此等均為種田之人，都有家口，如果長期在外，則於其生活無益。故臣欲將其視同外旗軍人，一年一輪換。此外，這一期間彼等因當差行走於塔爾巴哈臺，亦當視其若戍邊之厄魯特兵，使其領得鹽菜銀口糧。^④

三

哈薩克統治者用察合臺文向清朝寫信的最早時間與上述清朝邊疆政策變化開始的時間是基本吻合的。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最早發往清朝的哈薩克察合臺文書信是哈薩克中玉茲蘇勒坦

① 此指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處。

② 此處作者本意似欲說明“哈薩克無托忒文字”，因為作者提到了哈薩克使用回文的情況。

③ 即將回語翻譯為滿語或漢語。

④ 《伊犁將軍伊勒圖奏選派回子赴塔爾巴哈臺處理與哈薩克來文書摺》，見《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146冊，第49—52頁。